

·技术与人类·

“赛博格”与“数字永生”不是一回事

□刘永谋

很多人相信人类再造技术迟早会出现。比如装上可以从水中吸收氧气的机器腿,智人就能变成水陆两栖动物。在科幻电影《未来水世界》中,这样的变化是由自然选择完成的,但人类再造技术可以采用新科技方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有意的选择过程。《三体》里的三体人进化出能脱水的肉身,以度过严酷的乱纪元,然后在恒纪元泡水恢复。我们相信,人类再造技术能帮助智人实现适应更严酷生存环境的目标。

地球上有一些物种,如非洲肺鱼可以度过缺水漫长旱季。以水熊虫为例,它对严酷环境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地球。它能缩成圆筒状自动脱水,脱水后能在150℃和零下200℃的环境中存活。常温下给予水分便能恢复。有证据表明:水熊虫在严酷的太空环境中,也可以脱水存活10天之久。如何向水熊虫学习生存技能呢?即智人“赛博格化”。“赛博格”概念最早是美国国家航天局的高级工程师提出,针对的就是人体如何适应外太空严酷生存环境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技术手段改造并强化宇航员的身体,使之成为“赛博格”——这个词是“控制论(cybernetic)”和“有机体(organism)”的组合。不过,今日的“赛博格化”不再仅仅针对外太空使用,而是泛指智人肉身经过新科技改造之后新生的“后人”类。

简单地讲,赛博格是人类与机器,尤其是智能机器的结合体。智人与智能机器的结合可以分为身体器官、组织与机器的结合(如已经开始商用的机器外骨骼)、大脑意识与机器的结合(如近年被炒热的脑机接口技术),相比较而言,后者更为困难,因为智人的意识太过复杂,迄今为止,

·序跋集·

“前信息社会”人们如何交流

□[美]罗伯特·达恩顿

交流已成为现代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它似乎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认为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和时代都是崭新的,是前所未有的,并将之称为“信息社会”,仿佛在暗指此前的社会不怎么关注信息。

那么请想象一下,在前信息社会,当男人在田间劳作了一天之后,或者,当女人偶尔在镇上的取水处聚会时,他们会交流些什么呢?

显然,认为前信息社会没有信息流动只是一种幻想。自从人类学会交换信号以来,每一个社会阶段都会有信息交流。现代通信技术的奇迹让人们人们对过去产生了误解,甚至让我们误以为交流是没有历史的。

漫长的世纪里,大多数人不识字,口语是交流中最重要的元素,如果我们不能将这一缺失的元素找回,那么交流的完整历史将无法呈现。

本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少数情况下,口头交流会留下存在证据,因为它们具有冒犯性。本书附录部分的档案材料便是来自一次警察行动,此次行动涉及的范围是我在文献研究中见到的最广的一次。

1749年,警察们在巴黎全城追查6首诗。事件开始的标志是警察逮捕了一名医学院的学生,他背诵了一首抨击路易十五的诗。在巴士底狱,这名学生交代了他是从谁手中获得这首诗的;第二个人随即被捕,也招供了来源;最后,警察往巴士底狱的牢房里塞了14人。

沿着警方在逮捕一个又一个人时所追寻的线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复杂的信息交流网络,研究信息在半文盲社会中传播的方式。

这当中涉及的信息传播方式有好几种。这

·无限杂思·

你独一无二,所以你有限

□刘洪波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即所谓“灵魂三问”或“人生三问”,是人的原发性问题。原发性是说这些问题几乎每个人都会向自己提出来,即使不是经常,也总是会在某些时候冒出来。

这些问题是平平无奇的,经常能在具体场境中给出回答。“我是谁”,我是某某,我是某某的儿子,我是谁家的媳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某市某镇来,到某县某村去。如此等等,问答也完满。

这些问题也深具哲学意味。它们让人“认识自己”,使其主体意识觉醒。“认识你自己”,也是一个具有醒脑作用的命题。我们的认识如同手电筒,经常是把光打在别的东西身上,认识桌子,认识电脑,认识他人,“认识你自己”则是把认识的光芒照到自己身上,这是一种返回自身的思考,也就是反思。苏格拉底的反思是,“我知我无知”。

人不是物,这是显而易见的。人是主体,面对自然,面对世界,面对物体。同时他既是个体,也属于类存在(人)。因此,问“我是谁”的时候,人不是只把自己从自然、世界、物体中区别开来,也把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确认自己不同于所有这些,确认自己是“独一无二”。

“我是谁”也可以指“我们是谁”,从而建立起各种特征性的人群归属。作为特征的,有家庭、种族、肤色、信仰、兴趣、特长等等,人群数量大小小。最小的我们是两个人,最大的我们是全人类。首先有“我”,然后有“我是谁”。因此,“我是谁”是问他人,也是问自己,也是问世界。如果没有它、没有世界,我就失去了参照和比较、环境和条件,那么“我”无以体现差异,无以区别于什么,“我”也因此不成其为我。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是空间之间,而是时间之间。三个问题包含了全部的时间维度,从而形成了“我”作为时间性存在的完整提问。

“我是谁”,是确认自我的存在,而存在是现实的在,所以“我是谁”是一个关于现在的问题。我通过自己的这张脸、我的身体特征,以及我能够思考包括“我是谁”之类问题,验证自己是一个人,不同于他人,独一无二。独一,表明你是唯一者,要独自面对自我;无二,表明你无法依赖其

专栏



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有《智能革命后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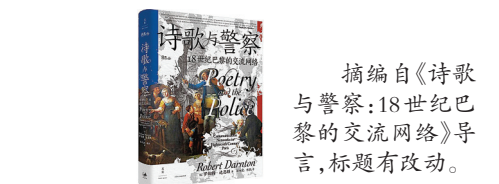
我们了解的相关知识还非常有限。现实中,“复制大脑”技术不仅根本还不存在,而且连一点儿影子都没有。

如今在尝试的数字永生技术走的不是“复制大脑”路线,而是克隆路线,与商家广泛使用的数字画像原理基本上一样。

我们天天在网上买东西,买什么、怎么买的、用什么App、出了问题怎么处理的……这些信息都被商家利用来分析你的购买行为,然后将你的购买行为分解成一些参数,为你“画像”,比如你是一个电饭煲只买得起价格100元以下的“砍一刀迷”,之后,平台就能有的放矢地给你“投喂”广告。

“克隆”不光是分析你的购买行为,更主要的是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扒取”你说过的话,加上分析你电脑里所有的资料:上传过的照片、看过的书、写过的东西、浏览过的网站……通过分析你在元宇宙留下的所有数字痕迹,解读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用程序模拟你说话和社交,好像“复制”了你的意识一样。在你死后,你的“思维克隆人”还活着,可以继续和你的儿孙“说话”。

无形的精神财富都可以数字化,在虚拟世界中传承,但有形的物质文明是不能完全电子化的。比如,元宇宙世界里的虚拟长城、虚拟呼伦贝尔大草原和真实的场景始终有本质差别。电子生命身处元宇宙中,并不是真正在生活着,他们虽然没有了死亡的忧虑,但本质上仍然区别于会死的智人。



摘编自《诗歌与警察: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导言,标题有改动。

14人中的大多数都精通书面文字,在碎纸片上誊抄了上述的诗歌。多亏警察在搜身时没收了它们,其中一些纸片才得以保存在巴士底狱的档案中。审讯过程中,这14个人中有人透露,他们还互相朗诵并背诵了这些诗。比如,一位巴黎大学的教授凭借记忆背出了其中一首80行之长的诗。

记忆的艺术在旧制度的信息传播系统中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而最有效的记忆方法则是音乐。“14人事件”涉及的6首诗中,有两首被谱成了曲,可以按照人们熟悉的曲调演唱。在当时的歌曲收藏著作(通常被称为“歌集”)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两首诗歌的踪迹。此外,歌集中还有另外一些歌曲和其他形式的口头交流,比如笑话、谜语、谣言和俏皮话。

巴黎人一直在给老曲子撰写新歌词。诗歌经常谈及时事,随着事件的发展,匿名的“才子”又写出了新的歌词。因此,这些歌曲同时也是对公共事务的实时评论,而且数量非常多。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14人事件”如何融入音乐歌词,并通过传唱将消息传遍巴黎的大街小巷。我们甚至能够听到这些音乐,至少能听到现代人用当时可能存在的曲调唱出来。虽然歌集和没收的诗句中只包含了歌曲的歌词,但它们给出了曲调的标题或第一行歌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音乐部的“解码书”以及类似的音乐注释文献中查阅这些标题,我们便可将歌词与旋律联系起来。人们可以借此了解信息如何受音乐影响,如何在街巷间传播,以及如何进入两百多年前巴黎人的大脑。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他。

这意味着,我的处境属于自己,我的问题要由我自己来解决,我的悲欢没有人替代,我的责任也没有人代为担负。

“我从哪里来”,这是在确认“我是谁”以后顺理成章会涌现的问题,是关于历史、过去、来源的问题。我的身体从母亲那里来,我的记忆和想法从经历过的事情来,我的社会标记从先辈那里来。我们的祖先人类从猴猴那里来……各种源头追溯到底都容易无从解答,使“我从哪里来”最后变成一个谜团。

但无论如何,我们能够随时开始时间向后的溯源之旅,从而让自己活在历史中,而不像孙猴子那样没有任何历史负累或历史财富、没有做什么梦的包袱或者前在规定、真正赤条条地屹立于天地间。

“我要到哪里去”,这是在问未来、问目的、问去向。它不像“从哪里来”那样,是一种定数,而是敞开的局面,是自由的选择。未来有多种可能性,但你将做出选择,把充满自由度的可能变成没有自由度的现实,未来有多种,现实只有一种,你选择了一种就意味着其他的可能性被放弃。

你选择某一种生活,其他无数的美好生活都不是你的生活。你只有一个身体,不能既在这里又在那里。你是独一无二,没有孙猴子那么多分身,这既是自我的高贵和骄傲,也是自我的局限和悲哀。

“我要到哪里去”,虽是自由,但往往也不是想到哪去就到哪去。这既涉及选择的条件,即未来展开的可能性;也涉及“我”对生命意义的确定,即人生价值追求。

前者是现实约束,经常受“我从哪里来”影响,让你只能在可及的范围内面向未来,技术约束使你不能选择到月球上居住,法律限制你不能把他人东西据为己有,类似约束还有许多。后者是你认为什么才是最重要、最值得,经常由“我是谁”左右。因为你独一无二,你此生后不可能再活,而且此生也是时间有限,而可能性很多,因此你只能选最值得的,为此需要放弃在价值观排序上不在最前面的一切选择。“既要、又要、还要”,单个的“我”要弹好这个钢琴,不可能。

专栏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老报刊里的日本侵华实录》丛书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捐赠人,该书主编谢华说,十多年时间里,他到武汉、广州、南京等城市,在各图书馆、旧货市场中寻找涉及日本侵华的老报刊,抖落时光积淀下的尘垢,剔除模糊不清的文字污点,细加保护修补,将其扫描入档。《老报刊里的日本侵华实录》丛书的每一页,都记载着关于日本侵华的真实报道以及抗战将士奋勇杀敌的事迹。这些报道凝固着岁月的记忆,封存历史的铁证,以最原始、最直观方式,定格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的残暴行径与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深重苦难,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伤痛记忆,不容置疑,不容篡改。这些史料对于深化日本侵华历史研究,驳斥一切试图淡化、歪曲甚至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的错误言论,具有无可替代的珍贵价值。

谢华表示,捐赠实录丛书,不仅是将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托付给值得信赖的机构予以珍藏与研究,更是希望它们能从历史的幕后走向前台,发挥更为广泛的社会教育与警示功能。特别是让年轻一代,铭记这段饱含屈辱与抗争的历史,深刻理解和平来之不易,誓死捍卫国家尊严。

这套丛书共6册,分为战争篇、经济篇、教育篇、政治篇等四卷,将1931—1945年期间我国出版的诸多报刊刊载的记述、评论日本侵华罪行文章作了系统的梳理。

多位专家学者认为,这套丛书的独特价值

《春秋楚史》出版座谈会在汉举行,与会专家评价——

集楚史研究之大成,堪称“楚史巨制”



9月21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春秋楚史》出版座谈会在武汉中心书城举行。十余位深耕楚史与楚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该书的出版背景、成书历程、学术突破及文化价值展开深入研讨,为推动楚学研究纵深发展、传承荆楚文脉凝聚共识。

“武汉城区的发展最早是从汉阳开始”

《春秋楚史》是程涛平耗时数十年构建的《楚国通史》宏大系列的第二部,上承已出版的《先楚史》,下接即将完稿的《战国楚史》,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四册、逾两百万言,全面重现了春秋时期楚国近300年的历史图景——从政治制度的演变、思想文化的流变,到社会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形态的发展,均作出考证与阐释。

“春秋时代是一个创造出繁荣经济与文化的辉煌时代,也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学术大师辈出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楚国处于春秋时期政治发展变迁的中心地位。”程涛平介绍,《春秋楚史》写作的艰难,高于142万字的《先楚史》,主要是楚国在春秋时期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追求楚史“集大成”,必须沙里淘金,择善而从,最终出版200万字。

翻开书页,仿佛穿越至春秋时期的楚国,在字里行间感受楚文化的深邃内涵,领略楚地历史的雄浑与浪漫,也能从书中发现武汉的文脉之源。

书中透露,楚庄王十六年,楚庄王在长江与汉水的汇流处建立夏州,就是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汉阳。见于《左传》宣公十一年记楚“乡取一之人以归,谓之夏州”,是指楚国在陈国抽取一个“乡”的人口到夏州定居,成为楚国的居民。程涛平认为,时为公元前598年,应该是武汉市城区形成的最早文献记载,距今有长达2600余年的历史。“这条记载表明,武汉市城区的发展最早是从汉阳开始,武汉市的第一批居民是从陈国的国

快览>>>

《守望传统:在田野寻找人文》石硕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踏遍山河写成的学术散记,凝聚了作者多年民族学研究与田野考察成果。全书分为“大地经纬”“文明长河”“生命学问”三篇,涵盖三江源人文地理、民族交流、城市历史、学人与教育多元主题,实证分析雪域高原生态、康定与成都城镇景观等自然人文风貌,解读藏彝走廊族群迁徙、茶马古道等文化路线。

《中国艺术沉思录》李霖灿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著名美术史家李霖灿先生写给大众的美学启蒙书,以清新质朴的笔触、生动的故事见闻、专业的学术功底,拉近普通读者与静态、遥远、陌生的艺术作品的距离。本书选取了古画、书法、陶瓷、石头、线条、墨韵等22个有趣的主题,涉及作品门类、技法表现、人物、意境等多个欣赏维度,串联起300多件珍贵文物,细致分析艺术作品美在何处。

《月光旅社》石若昕 著 译林出版社

新学期伊始,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正式公布第69期共读书目,《月光旅社》入选四年级共读书目。《月光旅社》通过温暖的叙事和奇巧的想象,为孩子们种下真、善、美,种下纯洁、天真和柔软,种下丰富的情感和对世界的好奇。《月光旅社》既延续了经典童话的真善美内核,又以当代儿童喜闻乐见的奇幻冒险形式,展现了敏锐的成长洞察和文化温情。

《老报刊里的日本侵华实录》见证历史

“南京大屠杀”这一术语首先见于武汉

在于,提供了很多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如此,昨天的报纸已经是今天的历史,读“合订本”有助于发掘历史隐秘的真相。

比如,“南京大屠杀”这一术语,是如何经媒体报道走向公众视野的?

如今,“南京大屠杀”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定的历史专业术语,被中外史学、新闻、外交、司法及军事界普遍使用。根据《老报刊里的日本侵华实录》的资料,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词汇,最早见于中文出版物,可追溯至1938年4月汉口出版的《世界展望》半月刊。

“南京大屠杀”一词的首次出现,与一位名叫汪思梦的译者密切相关。1938年3月16日,香港英文报刊《南华早报》刊载了题为《南京的暴行》(The Atrocities in Nanking)的报道,内容源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George Fitch)在广州的一场演讲,以其亲身经历揭露日军暴行。同年4月5日,汉口出版的《世界展望》半月刊第3期刊登汪思梦对该文的翻译,但并未直译原词,而是创造性地拟定为《南京大屠杀目击记》。这是“南京大屠杀”五字首次以标题形式出现在中文报刊中,标志着这一历史概念的话语诞生。

《世界展望》在译文前加有编者按语,痛斥日军“施行人类有史以来最无赦的大屠杀”,呼吁国人铭记这段“二十世纪的活地獄”。汪思梦在“译者志”中说明,该文译自费奇在广州一场茶会中的演讲,并将其内容进一步分段,拟出如“尸体满街山积”“强奸案件无数”“十岁到七十

《春秋楚史》出版座谈会在汉举行,与会专家评价——

集楚史研究之大成,堪称“楚史巨制”



都、今河南周口淮阳一带迁徙过来的陈国人口。夏州到战国时期已经相当繁荣。”

谈到楚国礼乐文化时,程涛平认为,楚人在后来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深受中原文化的熏染,说雅言,书夏文,用中原礼法,参与东周中原各国的政治、军事角逐。“当然楚文化又有其自身的民族和区域特色,如楚人崇风尊火,尚赤,尚东,尚左,崇巫,忠君,等等,都自成一体,显示着楚人由夷而至非夷非夏(亦夷亦夏),最后与华夏融为一体的文化特色。”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都是被楚人推翻的”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对《春秋楚史》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集楚史研究之大成。作为一部着眼于春秋时期楚国史的著作,本书具有以下亮点:第一,遵循文献年代框架,还原历史本真。书中大量引用先秦历史文献,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与解读,梳理春秋时期楚国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二,融汇出土文献成果,突破研究边界。书中系统整合清华简、上博简、郭店楚简等重要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与传世古籍相互印证,彼此补正,为还原春秋时期楚国历史细节提供了全新视角。第三,兼顾历史完整性与评价客观性。在完整叙述春秋时期楚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基础上,作者对每位楚王的执政举措、历史功过作出客观评价。

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敏认为,本书的出版体现了程涛平“求全、求简、求深、求通、求新、求文采”的治学态度与学术精神,对楚国史整体的学术研究非常有帮助和启发。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杨华指出,春秋时期楚人另外建立了一套文化系统,并自尊为王,但是又主动地实现华夏化或者去“蛮夷”化的过程,为

《日本遣唐使研究》李广志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本书把遣唐使放在世界史的视角加以审视,突破了以往学者强调的东亚,揭露了唐日关系的本质。同时,本书又以文化视角对唐日间人员的移动与交流、唐文化传播入日本与日本唐文化的形成等进行研究,进而证实,大唐有形之物与无形的知识、文化及习俗等,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遣唐使之路,是一条代表性的“海上丝绸之路”。

《英格兰的扩张》[英]约翰·罗伯特·西利 著 林国荣 霍伟岸 胥博 译 上海三联书店

世界史学界“帝国史”研究范式的开山之作,霍布森《帝国主义》、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主要理论来源,《剑桥英帝国史》之本源,首版142年后第一次推出中译本。该书首次将现代英国成长历程置于一种全球新视野中进行考察,首次提出英国及定居殖民地(“大不列颠”)已经构成一个事实上的世界性国家的论断,影响深远。

《流动的盛宴:不可思议的食物之旅》[英]萨拉·默里 著 向丽娟译 商务印书馆

古罗马人用双耳罐把橄榄油从西班牙运输到意大利。今天,冷链运输可以让挪威三文鱼在冷藏状态下到达中国,加之之后再运到美国。本书以橄榄油、三文鱼、番茄、口香糖、咖啡、香蕉、酸奶、葡萄酒、茶、草莓、小麦和玉米为线索,揭示食物运输背后的技术革新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艺术的深远影响。(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专栏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老报刊里的日本侵华实录》丛书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捐赠人,该书主编谢华说,十多年时间里,他到武汉、广州、南京等城市,在各图书馆、旧货市场中寻找涉及日本侵华的老报刊,抖落时光积淀下的尘垢,剔除模糊不清的文字污点,细加保护修补,将其扫描入档。《老报刊里的日本侵华实录》丛书的每一页,都记载着关于日本侵华的真实报道以及抗战将士奋勇杀敌的事迹。这些报道凝固着岁月的记忆,封存历史的铁证,以最原始、最直观方式,定格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的残暴行径与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深重苦难,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伤痛记忆,不容置疑,不容篡改。这些史料对于深化日本侵华历史研究,驳斥一切试图淡化、歪曲甚至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的错误言论,具有无可替代的珍贵价值。

谢华表示,捐赠实录丛书,不仅是将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托付给值得信赖的机构予以珍藏与研究,更是希望它们能从历史的幕后走向前台,发挥更为广泛的社会教育与警示功能。特别是让年轻一代,铭记这段饱含屈辱与抗争的历史,深刻理解和平来之不易,誓死捍卫国家尊严。

这套丛书共6册,分为战争篇、经济篇、教育篇、政治篇等四卷,将1931—1945年期间我国出版的诸多报刊刊载的记述、评论日本侵华罪行文章作了系统的梳理。

多位专家学者认为,这套丛书的独特价值

《春秋楚史》出版座谈会在汉举行,与会专家评价——

集楚史研究之大成,堪称“楚史巨制”



上图:《春秋楚史》程涛平 著 武汉出版社

左图:座谈会现场。 马波 摄

后来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汇合,以及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整合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史不可回避的历史大事;楚文化史的面向很多,相关工作仍然不够充分,而且随着考古发掘的资料越来越多,相关研究也在不断更新,《春秋楚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别开生面,对于梳理楚国的历史脉络,比较中国文化的南北异同,大有裨益。

湖北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宋公文认为本书的特色是充分利用了考古挖掘资料,尤其重视运用金文和简牍文献。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蔡靖泉概括了本书的三个特点:一是博采众长,自成体系;二是不从人云,自创新说;三是纵横展开,史事结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学系主任、楚学研究所所长宋亦箫称赞本书重视考古实物材料的运用,有将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三者优点熔为一炉的融合之效。

江汉大学原副校长徐文学说:“我读《春秋楚史》,感受到了楚国对于中国城市发展史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最早实现县制的国家,楚国在中国由先秦邑制城市向秦汉郡县城市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开拓之功。楚史研究的现实价值在于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楚国这个曾经的历史巨人,虽然国家实体灭亡了,但却在文化与精神上完成了对胜利者的‘反向征服’,并将其独特的基因深深植入中华文明尤其是武汉城市文化的灵魂深处,从而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永生。楚人尚武、阳刚、雄蛮的英雄主义与崇风、尊巫、阴柔的浪漫主义,看起来水火不容,却又融合得天衣无缝,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到‘亡清必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和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都是被楚人推翻的,这是历史和文化的神秘所在。”他评价说,《春秋楚史》内容上通下结合,体例上既继承传统,又推陈出新,堪称“楚史巨制”。

(长江日报记者叶飞艳 通讯员蔡文华 曾思浩)

《守望传统:在田野寻找人文》石硕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踏遍山河写成的学术散记,凝聚了作者多年民族学研究与田野考察成果。全书分为“大地经纬”“文明长河”“生命学问”三篇,涵盖三江源人文地理、民族交流、城市历史、学人与教育多元主题,实证分析雪域高原生态、康定与成都城镇景观等自然人文风貌,解读藏彝走廊族群迁徙、茶马古道等文化路线。

《中国艺术沉思录》李霖灿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著名美术史家李霖灿先生写给大众的美学启蒙书,以清新质朴的笔触、生动的故事见闻、专业的学术功底,拉近普通读者与静态、遥远、陌生的艺术作品的距离。本书选取了古画、书法、陶瓷、石头、线条、墨韵等22个有趣的主题,涉及作品门类、技法表现、人物、意境等多个欣赏维度,串联起300多件珍贵文物,细致分析艺术作品美在何处。

《月光旅社》石若昕 著 译林出版社

新学期伊始,全国“百班千人”读写计划正式公布第69期共读书目,《月光旅社》入选四年级共读书目。《月光旅社》通过温暖的叙事和奇巧的想象,为孩子们种下真、善、美,种下纯洁、天真和柔软,种下丰富的情感和对世界的好奇。《月光旅社》既延续了经典童话的真善美内核,又以当代儿童喜闻乐见的奇幻冒险形式,展现了敏锐的成长洞察和文化温情。